

书生襟抱本无垠

近代风云人物杨度

张晶萍 著



梁启超称他为“典型的湖南人”，
袁世凯惊他为“旷代逸才”。
孙中山誉他为能履行诺言的“可人”，
而周恩来，临终前念念不忘要向世人证明，“他是我们的人”。
他是近代中国宪政的首席专家，
又是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党魁。
他是青帮大亨杜月笙公馆里的神秘客人，
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一生而数变，一身而兼数任。
这就是百年中国传奇政治活动家——杨度。

张晶萍 著

书生襟抱本无垠

近代风云人物杨度

SHUSHENG JINBAO BENWUYIN

JINDAI FENGYUN RENWU YANGDU



Q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江苏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生襟抱本无垠：近代风云人物杨度 / 张晶萍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495-0894-5

I. 书… II. 张… III. 杨度 (1874~1931 年) —
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981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1)

开本：889 mm × 1 240 mm 1/32

印张：7.625 字数：164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册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梁启超称他为“典型的湖南人”，
袁世凯惊他为“旷代逸才”。
孙中山誉他为能履行诺言的“可人”，
而周恩来，临终前念念不忘要向世人证明，“他是我们的人”。
他是近代中国宪政的首席专家，
又是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党魁。
他是青帮大亨杜月笙公馆里的神秘客人，
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一生而数变，一身而兼数任。
这就是百年中国传奇政治活动家——杨度。

——题记

目 录

一 那一夜的生死契约/1

时务学堂里的不速之客/1

湘军后代,帝王学的传人/8

二 胸中演绎天下那盘棋/18

相如空有上林赋,不遇良时空自嗟/18

江亭初题,叹斜阳衰草/23

问我东山高卧时,苍生扰乱应思起/27

商量旧学,迎接新知/31

游学东瀛,舌战嘉纳治五郎/34

三 遭遇“名捕之祸”/47

海归,海归/47

十二天的榜眼梦/49

二次东渡/56

四 东京最有势力的人/59

唱响《湖南少年歌》/59

呼应国内废约自修运动/67

孙杨盟约/71

出任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长/73

五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75

“他是日本间谍”/75

史上级别最高的枪手/79

杨梁组党：一次难产的合作/83

我的主义叫“金铁”/86

六 清末宪政首席设计师/93

一颗冉冉升起的宪政明星/93

遭质疑的宪政国师/99

采菱来了/101

主张借款修路惹众怒/106

再促开国会，力争《新刑律》/111

七 袁世凯的智囊/117

杨度与袁世凯/117

共济国事，表决国体/121

秘密参与南北和谈/124

牺牲党见，赞成共和/127

八 闲看世变浑无事/132

袁总统上台了，总理不是我/132

我不入党,除非你们取消政党政治的主张/136

帮忙不帮闲/141

临了,政治会议议长变成了政治会议议员/146

我的位置在哪里/149

九 搭建人脉,另谋出路/151

劝师出山/151

结交袁克定/157

反思民国乱象,力倡君宪救国论/159

十 风云无法齐际会/163

走民意路线的帝制运动/163

“书痴自谓不痴”/170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172

蔡锷与杨度/176

君宪有罪,罪在度身/178

十一 别了,我的君宪/184

无人求保的帝制祸首/184

愧对师恩/187

坚决对张勋复辟说“不”/189

十二 一自庐山看月后,洞彻身心俱了/193

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193

政商两界,皆成畏途/195

夜登庐山,看月悟道/200

十三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203

践履诺言,为孙中山解围/203

纵横捭阖于军阀之间/210

一元钱运动教育总长/214

十四 最后的谜团/219

营救李大钊/219

杜公馆里的客卿/221

谁是杨度入党介绍人/222

夏衍眼里的佛学党员/224

真相尚未大白/226

一 | 那一夜的生死契约

时务学堂里的不速之客

1898年的春天，湖南长沙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时务学堂第二期招生正在进行；《湘学报》旬报之外，又有一种日报《湘报》出版发行了；一个叫“南学会”的新型组织成立了。人思自奋，家议维新，一派生机盎然，与早几年的情形判若天壤。

说到近代湖南，英国传教士马歇尔·布朗荷这样形容说：“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之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务的反应，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留情。所以，在中国其他各省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时人记述，直到1897年，洋人尚未进入长沙。于是恼羞成

怒的外国传教士遂将长沙(乃至湖南全省)诬为“铁门之城”，意即一个“拒绝文化洗礼”的地方。湖南为什么这么牛？就是因为它是湘军的家乡，湘军的胜利带来了湘人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的使命感与相信名教无往而不胜的自大感。

众所周知，当年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所宣传的那一套天父天兄众生平等说，更是对传统儒教形成了摧枯拉朽的破坏，“举凡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在饱读诗书的儒家士大夫看来，真是名教奇变！是可忍，孰可不忍！于是，在籍侍郎曾国藩振臂一呼，号召凡我读书识字之人，都要起来“殄此凶逆”，要慰孔孟人伦之隐痛，要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在维护纲常名教的激情指引下，曾国藩等儒生投笔从戎，组织起湘军，对抗太平天国。历经十余年的征战，湘军终于击败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成就了湖南作为“忠义之邦”的形象。

然而，湘军的成功给湖南带来了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湘军走向全国，湘军将领成为晚清政坛上一支重要力量，湘人名声大振，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的局面。一批湘军将领成为清政府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甚至跨出国门，目睹西方资本主义政教制度的优越，成为倡导洋务、介绍西学的先驱。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就是中国洋务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郭嵩焘、曾纪泽是政治现代化的积极倡导者。另一方面，高度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助长了湘人的自负感与使命感，强化了湘人自觉卫道的社会观念。在曾国藩等人看来，湘军的胜利就是理学对西教的胜利。曾氏兄弟在攻下天京后，大肆刊刻《船山遗书》，利用王夫之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湘军将领还通过大修地方志，为阵亡将士建立专祠等

形式,来宣扬其忠义思想。这样,恪守封建忠义、维护传统圣道的湘军成为湖南士人心目中的道德典范,争先效法的众趋人格。耻言洋务,排外仇教,成为晚清湖南的一股风气。这时的湖南,可谓是全国最为保守的省份。

这个迷梦一直做到1894年,岁在甲午。其时中日战争爆发,防守辽东的清军不堪一击,接二连三溃败。危难之中,湖南巡抚(省长)吴大澂主动请缨,率湘军三万余人,自长沙奔赴前线。不料,不知是湘军失去了当年的锐气,还是今日倭寇非当年长毛可比,湘军竟然也无法扭转局面,亦是接连败退。次年,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堂堂帝国,竟败给蕞尔小国!这份刺激是何等强烈!湘中经师皮锡瑞感慨:“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湘籍才俊谭嗣同更是发出了悲鸣:“世间无物抵春愁,合身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举国上下,莫不感创巨痛深,而以天下为己任的湖南人更是引以为耻,认为“甲午失败,实在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两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虚骄之气顿失,负罪之感顿生,求变自强之风蔚然兴起。于是,湖南由全国最为保守的省份之一,一变而为全国变法维新的先导区。当光绪皇帝尚未颁布变法诏令之时,湖南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设警察局啦,开工厂啦,创学会啦,好不热闹。

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最令人兴奋的还是维新派办了一所学堂,叫“时务学堂”。这所规模不大的学堂是当时湖南省内、长沙城里最时尚的学校,有志青年无不以入时务学堂就读为荣。1897年下半年,时务学堂首度招生,40个名额很快爆满。尽管时务学堂后来又分期招生,但远远满足不了有志青年的需求。由于学堂

名额有限,以至于当时的校董之一张祖同,递条子打招呼想让自己的几个关系户的子弟入学,都遭到校长熊希龄的拒绝。两人因此产生了矛盾。张祖同是晚清著名的湘绅,是后来所谓“四大劣绅”之一,又是晚清重臣张百熙的胞弟。以这样的身份去开后门,都遭拒绝,足以说明学堂名额的紧俏。

这个学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除了因为它是维新派开设的之外,还在于它的名师效应。这所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是一个叫梁启超的人。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省新会县人。说到梁启超的大名,那真是如雷贯耳!据说,他17岁参加乡试时,以文才打动了考官李端棻,后者赞赏之余,竟然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了他。这就是后来的梁夫人李蕙仙。考试一场,赢得了一个老婆,梁启超的才气够大的。

梁启超中举后,又跟着一个叫康有为的人学习。康有为(1858—1927),原名康祖诒,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后来人称“康南海”。这事奇就奇在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之时,康有为还是诸生(秀才)。以举人拜诸生为师,真是闻所未闻。康有为教了梁启超什么呢?要让他教梁启超考试宝典、科举攻略之类的东西,怕是教不出来的。可是,能把梁启超吸引到门下,康有为必定有过人之处。简单来说,康有为有一门时髦的学问,叫做“公羊学”。公羊学可不是研究羊的雄雌这类生物问题,而是《春秋》学中的一个派别。

《春秋》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是由孔子根据鲁国旧史删订而成。后世儒者相信此书寄寓了孔子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由于该书语言简略,歧义极多,很不方便阅读,故解读这部儒家的经典文本显得极为必要。正因如此,如何解释《春秋》也就成为儒家

内部不同流派争夺话语权的战争。从汉代始,儒生对《春秋》的解释形成了三部主要的著作:一是《左传》,二是《穀梁传》,三是《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由此形成儒家春秋学的三大流派。《公羊传》最早的传人是战国时人公羊高,据说他曾受学于子夏。也就是说《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是直接从孔子的嫡传弟子子夏那里得来的。公羊学派与其他两个学派相比,他们更相信《春秋》的“微言大义”,即寓含着圣人的隐秘的教诲。后来学者们以此而衍生出一门学问,就叫“公羊学”。

康有为宣称自己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汉代以来,朝廷也好,民间也罢,所信的、所用的经书都是假的,是汉代刘歆伪造的,是一个弥天大谎。这个“学术发明”在当时真是石破天惊!康有为还说,真正的经学就是今文经学,是公羊学,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今天我们要继承孔子先圣的精神,就要进行改制。可见,康有为是要借孔子这块牌子来宣传他的变法思想。康有为强调孔子是素王,自己是孔子的代言人,所以号“长素”。一来二去,康梁师徒就成为晚清维新变法思潮的代表人物。

1895年,师徒二人一同进京赶考(考进士),正逢甲午战败后中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是,康梁策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再战。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当然了,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老百姓是没有权力议政的,这些举人们所递交的请愿书,也没有哪个人、哪个部门愿意为他们送达天听(到达皇帝手中),但从此康梁师徒名声大振。这次考试,康有为进士及第,在“六试不售”之后,终于成为一名进士,分配工作岗位,仅授工部主事(建设部科长)。这么小的位置岂是康有为用武之地?康有为坚不就任。他有鸿鹄之志,怎么安于当一小官?此后康有为差不多成了一个职业的维新变法的鼓动家。他趁公车

上书的浩大声势，办了一个学会，叫“强学会”，顾名思义，就是讨论怎样才能使中国强大的学会。一时人气之旺、吸引力之大，以至于袁世凯、张之洞这样的实权派人物都要求加入。当时，张之洞是湖广总督，有权有势，愿意出钱赞助这个学会，但前提是康有为别再宣传所谓新学伪经之类的怪论了。康有为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张、康合作破裂。强学会办了一份报纸，叫做《时务报》，主笔就是梁启超。梁启超是大才子，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感情丰沛，打动人心，成为《时务报》的品牌。一时间，言维新者，无不有梁启超。青年志士，读过梁启超的文章，无不热血沸腾，爱国之心油然而生，改革之志油然而起。

正因如此，1897年，当湖南维新派筹办时务学堂时，就一度有意聘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前人虽没有今天的营销意识，也认识到“名师”对一所新学堂的作用。只是机缘巧合，师傅没请来，却请来了名气更大的徒弟梁启超。于是，梁启超带着康梁学说翩然而至，很快成为各个阶层都争相交结的头面人物。

据说，梁启超入湘之前，曾与康有为手订《时务学堂章程》，将湖湘大地当成了其思想的试验地。他撰《春秋界说》、《孟子界说》，作为给学生宣讲的讲义，以《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他提出：《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古往今来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孟子界说》则认为孔子之学分为孟子和荀子两系，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大同思想，荀子继承了孔子的小康思想，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都是以荀子为理论根据，而孟子是以保民为经世之旨的，以此达到绌荀申孟的目的。湘人向来奉程朱理学为正宗，讲究的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一听到如此新颖见解，只觉眼界顿开！学有素养的湖南经师皮锡瑞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梁卓如送到《读〈春秋〉界

说》一卷见示，发明公羊家言。……梁氏文笔甚畅，使予为之，不能如此透彻，才力相去远矣。”有学问根柢的人尚且如此推崇康梁学说，更何况新进少年！一时康有为乃“三代以还一人，孔子之外无偶”之类的说法流传开来。康梁学说几乎成为“时务”的代名词。

理学之乡竟让康梁“邪说”风靡其上，这让本土的硕学通儒“情何以堪”！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识破康有为学说的真伪吗？

有。不用说，这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劣绅”叶德辉。梁启超入湘之初，此公与梁“酒食往还，极融洽”。不过，表面上的相见甚欢并不能代替对对方思想的认同。叶德辉在给石醉六、刘端先、黄郁文等弟子的信中，打预防针，要求弟子站稳脚跟，不为邪说所蛊惑。至后来，更是著书立说，攻讦驳难，成为湘中“翼教派”的头领。这一段历史，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但不为人注意的是，就在康梁学说如日中天之时，湘中亦有“站稳了脚跟”、不为所惑的士子。

戊戌年正月二十三（1898年2月13日），一位身材颀长的青年，昂首阔步，来到了时务学堂。他不是求插班，不是来请教，而是来领教梁启超到底有几斤几两。一番交谈下来，青年发现，梁启超讲《春秋》公羊学，虽然知道“圣人非宋儒”，却不提这个观点的发明者王闿运；又强拿《春秋》去附会《万国公法》，真是削足适履，欺世盗名！青年不由得大为不屑，两人争论起来。据说，起初梁启超还放肆为自己辩护，到后来竟理屈词穷。青年越发得意，滔滔不绝，直到天黑了才离开。最后，青年得出了一个结论：“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梁启超这个被万人景仰的维新巨子，拿康有为那一套《春秋》学来误人子弟，骗人钱财，可惜可惜！三天之后，青年再次见到梁启超时，梁患上了疟

疾。恃才傲物的青年竟洋洋得意地说：“卓如竟患疟疾，陈君移檄，何如杨子《春秋》！”认为是自己对《春秋》的正宗见解把梁启超吓病了。后来梁启超离开了湖南，青年更是将功劳记在了自己名下，认为是自己驱逐了梁启超。

这个自命不凡的青年人是谁？他就是杨度。

杨度凭什么冒天下之不韪，挑战湖湘子弟的精神偶像梁启超？为什么要驱逐梁启超呢？这就要说到杨度的家世和师承了。

湘军后代，帝王学的传人

杨度原名承瓚，字哲子，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他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三（1874年元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村，是名副其实的湘军后代。他的祖父杨礼堂参加湘军李续宾部，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他的大伯杨瑞生随其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后来，杨礼堂阵亡，杨瑞生死里逃生，并由军功升为总兵（军分区司令员），先后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杨度的父亲杨懿生是杨礼堂的第三子，天资聪明而身体虚弱，在家耕读，冬闲时或遇乡有红白喜事，参加木偶戏班，在里面吹吹打打。后练武术，身体渐强。因父兄在湘军中颇有影响，便进入曾国藩幕。据记载，杨懿生“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杨瑞生还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官。不幸杨懿生三十出头就去世了，留下杨度兄妹三人。

杨度有兄妹三人，自己居长，另有弟弟杨钧，光绪七年（1881）七月初九日生，派名承冕，字重子，号白心，后为书画家；妹妹杨庄，字少姬，又作淑姬，后成为湘潭著名的才女。

父亲去世后,杨度兄妹得到伯父杨瑞生的接济照顾。可以说,是伯父杨瑞生将他们养育成人的。杨家前辈以武将起家,杨瑞生希望后代以文章经济天下,从杨度这一辈开始,培养“书香门第”,所以不惜成本,高薪聘请老师在湘潭老家开办家塾,教授弟子,让杨度兄妹三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说,当年杨家每年的租谷是三百石,杨瑞生拿出一百石聘请塾师,可谓舍得教育投资。后来,杨瑞生又将杨度三兄妹接到归德府中。在这里,杨承瓚改名为“度”。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还练拳习剑,骑马射箭,并随伯父外出游览,接人待物,大受锻炼。为了使杨度的科举之路走得更顺畅,1892年,杨瑞生花钱为杨度捐了“监生”的功名,使杨度绕过竞争激烈的生员考试,直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1894年,年仅二十岁的杨度参加顺天乡试,一试而中,成为一名举人,获得了“正途出身”的第一张入场券,可谓少年得志。1895年,杨度入京会试,这次运气不算好,未能联袂成进士。不过,当时考进士一次成功的是例外,几次才中的很正常,甚至有垂老都不中的。1895年杨度进京入试的这年,正值康有为联络各省举人公车上书,杨度也参与其中。

杨度后来名声很大,奇闻逸事流传很广。奇闻逸事流传多了,便成了传奇。传奇多了,便遮盖了历史的真相。以至于时至今日,要想了解有关杨度早年生活的真实场景,依然要从各种传闻中辟出一条路径。

比如,有这么一种说法:

1895年,杨度入京会试。这年9月,康有为组织强学会,袁世凯经人介绍,加入其中。而杨度落第后,也逗留北京,经常去强学会帮忙,听演讲。这时的杨度早就读过康有为的著作,对康有为很是景仰。一天,杨度等人在松筠庵(当时是强学会人员经常活